

『山水画』与『画山水』

●刘化手

“山水画”与“画山水”，这两个词乍看相似，其实差异很大。“山水画”是国画中一门独立的画种；而“画山水”是对山水的客观临摹。这好像不难理解，但是有些学者一度混淆了这两个概念，引发了对“山水画起于何时”的长期辩论。

有画家说，山水画滥觞于魏晋；有史家说，画山水汉已有之，还列举了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历代名画记》中有关山川形象的文字描绘；有考古学家则列举了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中的山峦图像，以及汉代工艺品上刻画的山水，进而认为，中国山水画起源于魏晋的说法欠妥，时间起码应该推到汉代。

针对“山水画起于何时”的争鸣，早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有了，持续了几十年，至今仍时有争论。其实两种说法都没没错。作为国画种类的水画，确实是在魏晋形成的；而绘画山水，早在汉代，乃至先秦就有了。

“画山水”与“山水画”确实不是一个概念。“山水画”与“花鸟画”“人物画”并列为国画三大门类。虽然山水情结、山水文化早已有之，但是作为文艺形态的山水诗画，是魏晋时代的产物。魏晋时期，王朝频繁更迭，诸国兴灭无常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文人消极遁世，盛行玄学之风，谈道论玄，哲思活跃，促进了文艺理论的发展，文学上出现了中国第一本论著，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出现了山水诗鼻祖谢灵运；绘画上出现了中国第一篇专论，宗炳的《画山水序》，画山水由临摹自然转向超越自然，于是山水审美进入人们的视野，出现了山水画的萌芽；园林上虽无论著，但出现了以山水诗画为造境圭臬的“文人山水园”。可以说，中国山水画发轫魏晋。自魏晋以后，“画山水”由自发临摹走向“自觉”创造，形成了“山水画”。如果说“画山水”，求的是画得“像”，追求“形似”，画出的是“真山实水”；那么“山水画”，求的就是画出“意”，追求“神似”，画出的是“情山意水”。“山水画”风格多样，各有千秋，或荒寒苍古，或浑莽萧疏，或清新飘逸，或空灵幽远。为表达不同意境，点、线、墨的勾皴擦染上也各不相同。出现了艺术风格各异的山水流派，如水墨山水、青绿山水、金碧山水、没骨山水、浅绛山水等。

有些评论家说，秦汉之前画真山实水是中国“山水画”的童年阶段，自从“山水画”确立之后，中国“山水画”才真正成熟。其实这个说法也欠妥当。在艺术上而言，秦汉之前的“真山实水”未必就比魏晋以后的“情山意水”要低级。我们看一看西方绘画史就更容易明白这一点。西方的油画或水彩画中虽然没有“山水画”这一画种，但是西方有风景画、静物画，其中也有山有水，他们因世界风景（包括山水）的描绘讲究真实，所以“写实”成为西画区别于中国“写意”画的一个显著特点。为了真实反映，准确观察，他们采用科学的固定“焦点透视”法，这又是一个区别于中国游动“散点透视”法的特点。为了表现真实，他们讲究光影和色彩的明暗隐显，这也是区别于中国线条勾勒诗意表现的另一特点。可见，用画笔描写真实世界也是一门自成一体的艺术。

我国的山水画的发展，为什么没有沿着秦汉之前“画山水”的道路发展下去，而是变成后来的山水画呢？这需要从中国人的山水文化、山水情结、山水精神说起。

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”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，与地理环境不无关系。西方文化学者有“地理环境决定论”，此说未免绝对，但不无道理。我国地形复杂多样，名山大川分布广泛，山水或雄伟壮阔或秀丽蜿蜒。“山川之美，古来共谈。”莘莘大端，就有泰山、华山等五岳文化，洞庭湖、太湖等湖海文化，长江、黄河等江河文化。

从《易经》中天人合一的阐述，到《诗经》中对大自然山光水色的欣赏；从孔子“乐山乐水”的山水观，到庄子“物我合一”的审美观；从古人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的千古友谊，到欧阳修“在乎山水之间”的“山水之乐”，古往今来，在浩如烟海的山水诗文、山水绘画、山水音乐中，充分体现中国人深厚的山水情结。精神是文化的内核。山水文化孕育了山水精神，最突出的是中国人敬畏山水、顺应自然的精神和比德于山水的君子精神。这两种精神是我国儒道文化的重要内容。我国自然哲学的创立者老子，从山川河岳中悟出“人法天，天法地，地法道，道法自然”。庄子在“逍遥游”中对山水的体悟，深刻影响了后世山水画的审美。

孔子“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，巍巍高山培养了君子的博大胸怀；“君子见大水必观焉”，滔滔江河孕育了君子的高深智慧，这种道德比附和精神体验，在后世山水画中也有充分表现。

魏晋南北朝之后，游山玩水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新风尚，自然山水逐渐成为人们独立的审美对象。士人、官宦、僧侣等常常在名山大川之间吟唱作诗，参禅悟道，山水画派应运而生。

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有着丰富的山水文化、山水情结和山水精神，追求形似的“画山水”，最终演化成追求神似的“山水画”。当我们思考“山水画”与“画山水”之辨时，自然要回顾先贤大哲无比深厚的山水文化，不禁为中华民族拥有如此灿烂的山水文化而感到自豪。在新时代，我们不仅要深深植根于传统山水画土壤之中，还要充分吸收外来优秀绘画文化，融会贯通，书写中国山水画崭新的一页。

■ 我看我说

作之不止

●松向云

“作之不止”出自《资治通鉴》，原文为“作之不止，乃成君子”，意思是说只要坚持不懈地做好事，就会慢慢地成为一个君子。

“止”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，本义是足，有脚趾、地基、举止之义。从走路到达目的地之后自然不再走的角度，“止”又引申为“停止”。西汉桓宽《盐铁论》有言，“事辍者无功，耕怠者无获”，明人杨梦袁曾说，“作之不止，可以胜天。止之不作，犹如画地”，这些都提醒我们，“止”与“不止”，结果大不一样。唯有坚持不懈、锲而不舍，才有可能取得成功，学习也是如此。

“学习一定要学到底，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‘底’。”有一个著名的“荷花定律”。荷花后一天以前一天两倍的数量开放，如果到第30天铺满整个池塘，那么，前几天池塘中的荷花开了一半？答案是第29天。这个定律形象地诠释了作之不止、坚持到底的重要性。知识的获取，能力的提升，都需要绵绵用力、久久为功，如果心

无定力，意志薄弱，坐不得冷板凳，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，没有一股子坚持到底的劲头，“掘井九仞而不及泉，犹为弃井也”，自然难有大的作为。

古人云，“志士惜年，贤人惜日，圣人惜时”。作之不止，当珍惜大好年华，须知一寸光阴不可轻。在岁月的流逝中，唯有珍惜时间、并不断将时间转化为知识积累的人，才能学有所获、学有所成。汉代学者董遇提倡抓住“冬者岁之余，夜者日之余，阴雨者时之余”的时间读书。一代文豪欧阳修对人说，他作的文章，多在马上、枕上、厕上“三上”完成。据《鹤林玉露》记载，南宋官员张九成在被贬谪时，每天黎明时分，立于窗下读书，达十四年之久。他离开后，人们发现，他常常站立的窗下石头上，双脚的印迹都隐约可见。先贤为学惜时如此，可为后世借鉴。

作之不止，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攻坚克难，勇往直前的精神。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唐甄曾说：“我发虽变，我心不

变；我齿虽堕，我心不堕。岂惟不变不堕，将反其心于发长齿生之时。人谓老过学时，我谓老正学时。今者七十，乃我用力之时也。”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常人认为，年纪越大，治学则困难重重，但在唐甄看来，哪怕年老，也要治学不止。不老年岁，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境遇艰难也是常见。历史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在《爱晚庐随笔》中认为，很多硕学通儒都“处境至窘，身历百艰”，在诸多艰难困苦的磨砺下，仍然葆有奋发进取、坚持不懈的精神，最终“守得云开见月明”。

为学如登万仞山，欲临胜景莫畏难。如果把治学比作登临揽胜，正所谓“世之奇伟，瑰怪，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”，不老老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，涉深水，闯险滩，又怎能观天地之大，揽人间胜景？治学来不得半点虚假，作之不止，就要抛弃各种“小聪明”，甘下一番苦功夫。路遥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时，查阅了前后近十年的报纸和相关书籍，同时深入各阶层体验生活，三年准备，三年创作，前后历时十余年，最终写出了这部巨著。

万事从贵有恒。近代学者梁启超写过《论毅力》一文，他在文中探讨了古今中外成败的原因，得出的结论是“有毅力者成，反是者败”。当谨记，“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，目标一致，矢志不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滴下去——这才造就出滴水穿石的神奇”。

聊仍旧，只能看着梧桐树的影子慢慢地移动，自己的命运则没有丝毫的改变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中国古代诗人很喜欢写宫怨这个题材，其原因固然是他们很同情冷宫里那些不幸的女性，而更重要的契机则在于，他们自己在官场里的命运也只能完全看高层的好恶，弄不好就会翻车贬谪，被打发到近于冷宫的境遇里去。杜牧出身高贵，才华一流，而在晚唐的官场里却一向不得意，先是“十年为幕府吏”（《上刑部崔尚书启》），后来“三守僻佐，七换星霜”（《上吏部高尚书启》），离开早年的高自期许甚远，他以宫怨为题材写这么一篇篇幅比较长的词（术语谓之“慢词”），大约自有其不吐不快的怨气吧。

那时的曲子词一般由歌妓演唱，杜牧在南方各地充当幕僚时同这一类艺人来往甚多，为她们写这一首《八六子》，自是题中应有之事。

说杜牧词《八六子》

●顾农

洞房深。画屏灯照，山色凝翠沉沉。听夜雨，冷滴芭蕉，惊断红窗好梦，龙烟细飘绣衾。辞恩久归长信，凤帐萧疏，椒殿闲闭。

辇路苔侵。绣帘垂，迟迟漏传丹禁。薛华偷趁，翠鬟羞整，愁坐望处，金舆渐远，何时彩仗重临？正消魂，梧桐又移翠阴。

杜牧诗文皆佳，他还写词，传世者有《八六子》一阙，载于《尊前集》。

这首词的主题是传统悠久的“宫怨”。古代皇帝的后宫里女人很多，一般都希望能够得到皇帝的宠爱眷顾，可惜这种机会极为稀缺，又容易发生一度得意不久又落入边缘的危险。“辞恩久归长信”，“长信”是汉朝时一座著名的冷宫，才貌双全的班婕妤一度得宠，后来被更厉害的女人取代，禁闭在这里，从此只能过冷清而无聊的生活。（参见顾农《说乐府诗三题·〈怨歌行〉》，《名作欣赏》2018年第10期）盛唐诗人王昌龄咏叹其人的七绝题为《长信秋词》，凡五首，其第一首云：“金井梧桐秋叶黄，珠帘不卷夜来霜。薰笼玉枕无颜色，卧听南宫清漏长。”杜牧词的意境与此相近，写景抒情则更进了一层，尽管住处的建筑装饰用具摆设都还不失皇家的气派，而其绝对对可怕。长夜无眠，只听得雨打芭蕉，一派凄清萧瑟。君王的大驾何时光临？毫无消息，没有希望。

词的结穴处又道，白天不下雨了，而无



西夏木刻板画《义勇武安王位图》，出土于内蒙古黑水城遗址。

近日，曾在1994年版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里饰演关羽的演员陆树铭去世，这一消息引发了许多人的悼念。“关二爷”走了！人们对陆树铭的追思，既是对他完美演绎关羽的认可，也是对关羽人格魅力与忠义精神的追慕与遥望。穿越1800多年的风雨，关羽仍然活在人们心中。

从一介“亡命之徒”，到一代名将，再到封拜圣成为“关帝老爷”，关羽是文化上独一无二的奇观。行走中华大地，乃至海外他乡，关帝庙遍布四方，关公信仰根植人心。从庙堂到江湖，从都市到乡间，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

正史中关羽的事迹，主要见于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，但记载甚略，仅953字，加上裴松之注引也不过千余字。在史传中，关羽以武勇闻名，时人多称赞其“勇冠三军”“万人敌”“熊虎之将”。至唐朝，关羽的形象仍未超出猛将的范畴。

北宋初年，关羽曾因“仇国所擒”的经历，一度被宋太祖从武庙中撤出。关羽地位的提升是在宋徽宗年间，宋徽宗出于弘扬忠义精神、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，陆续加封关羽为“忠惠公”“昭烈武安王”“义勇武安王”。由于宋徽宗崇信道教，他还封关羽为“崇宁至道真君”，让关羽跻身道教仙班。及至南宋，因为朝廷偏安江南，蜀汉正统论成为主流，身为蜀汉武将的关羽更受到格外厚待，宋孝宗时关羽已为“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”。

到了元代，元世祖忽必烈正式敕封关羽为伽蓝，宫中做佛事也要抬出关羽像。与此同时，元杂剧中也出现大量赞美关羽的剧目，如关汉卿所作《关大王独赴单刀会》，成为后来《三国演义》中“单刀会”的母题。

明清两朝，关羽在官方与民间的合力推动下走上神坛，帝王们希望借助对关羽的崇拜宣扬臣子对君王之忠心，而民众则则寄希望于关羽这样的神勇之人降世，驱邪避凶，护佑一方安宁。明太祖朱元璋将关羽列入国家祀典，每岁岁暮及四孟遣官祭祀。嘉靖时，关羽已由“关王”升格为“关帝”，万历又加封关羽为“三界伏魔大帝”。



河南洛阳关林。

成长摄



河南新野汉桑城。

黎云帆摄



湖北当阳关陵。

黎云帆摄

大地上处处有关羽的足迹

●成长

暂归曹操，并为曹操斩袁绍大将颜良，拜汉寿亭侯。之后，关羽不忘旧主，尽封曹操所赐，奔刘备而去。此事成就关羽义薄云天的美名，并被后世小说演绎为“千里走单骑”的故事。

在河南许昌城西有一座灋陵桥，即小说中关羽辞曹之地，存有明将左良玉所立“汉关帝挑袍处”碑。实际上，灋陵桥本在长安，民间话本在编写关羽辞曹的故事时，误将出发地设为长安。及至罗贯中写《三国演义》，将出发地改回了许昌，却保留了灋陵桥关公辞曹的情节。于是，灋桥相送这一唐代以来的文学送别意象，在关羽及许昌身上又有了新的承袭与延续。

关羽复归刘备后，与刘备奔荆州刘表，驻新野7年之久。今河南省新野县中心有一株枝干遒劲，冠盖苍伞的桑树，与其他桑树不同的是，它的四周紧紧包裹着一圈两米多高的城墙，这座只有10余平方米的“汉桑城”被称为“世界最小的城”。民间相传，关羽在新野驻军时，一日不慎，其坐骑赤兔马将百姓的桑树啃光。关羽为补偿，亲手栽种了一株桑树，又让士兵砌了一圈城墙将它围起来，这便是“汉桑城”的由来。

由于关羽在荆州驻军多年，在河南、湖北、湖南等汉末荆州故地，此类与关羽事迹相关的遗迹尤多，虽然它们大多未必合乎史实，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，都可视为三国文化、关公信仰在民间传播的实证者。

单以关羽的武器为例，民间传说中关羽擅使青龙偃月刀（据史载，关羽在作战中使用的应为矛、槊一类的穿刺型兵器），这一带就流传有不少与关羽的刀相关的传说。如湖北荆门市辖区掇刀区就因关羽屯兵练军、刀掇巨石而得名，湖北武汉东湖有一名叫“卓刀泉”的水井，亦源自关羽以刀卓地、水涌成泉的传说。

捞刀河是湖南长沙市内的第二大河流，湘江支流。捞的什么刀？自然还是关羽的青龙偃月刀。传说关羽攻打长沙之时，不慎将刀落入湘水，周仓逆水而上，将宝刀捞了上来，遂有此河之名。

顺便说一下周仓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他为关羽扛大刀，鞍前马后，忠心耿耿，这是一个为丰富关羽形象而虚构的角色，

在历史中并不存在。而在湖北当阳东南，竟也存有一座周仓墓，有墓冢、墓碑和塑像。人们对周仓的纪念，实际上也是关羽忠义精神的一种延续。

历史上第一个以关羽命名的地名，是湖南省益阳市的关羽瀾。《三国志》载，建安二十年（215年），孙权与刘备争荆南三郡，双方对峙于益阳，隔水相望。关羽择选锐士五千人，欲投上流十余里浅滩渡河，孙权大将甘宁自率兵千余人连夜前往设防。关羽由是不敢渡河，结营于北岸，此地遂名关羽瀾。《三国志·吴书》在叙述陆抗的都督辖区时，有“自关羽至白帝”的描述，可见在东吴末年，“关羽”已成为益阳的代称。关羽瀾的位置，据考证在今益阳市六中以西资水中青龙洲一带。“关瀾惊湍”还是资江十景之一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，关羽败走麦城，在临沮为孙权所获，旋即遇害。《吴历》云，孙权将关羽首级送至曹操，曹操以诸侯之礼葬之。若如是，则关羽死后身首异处，分葬两地。如今洛阳关林与当阳关陵，相传即关羽的两处墓葬。按古代礼仪制度，帝王墓称“陵”，圣人墓方得称“林”。关羽墓称“关林”，可见其地位已超越帝王，跻于圣人之列，与曲阜孔林同级。

史书对关羽的相貌并没有具体表述，仅能够从诸葛亮在书信中称关羽为“髯”，可知关羽应留有美须长髯。现存最早的关羽画像是西夏时期的木刻版画《义勇武安王位图》，图中关羽丹凤眼、卧蚕眉、美须髯，与如今流传的关羽形象无异。

“义勇武安王”为宋徽宗加封关羽的尊号。可知早在北宋末年，关羽这一经典造型就已形成。该画像出土于内蒙古黑水城遗址，20世纪初为俄国人科兹洛夫盗掠而去，现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（冬宫博物馆）。

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《关羽擒将图》是知名度较高的一幅关羽画像，为明宣宗时画家商喜所绘。画中所绘为关羽水淹七军之后审问庞德的场景，画中关羽身着绿袍锁甲，抱膝斜坐于石台之上，长髯飘逸，神态威严。现今流传的关羽造像或画像，大抵与之相似。